

· 建党百年与青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专题 ·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共产党最早就是由一群为挽救和复兴民族大业以及拯救国民于苦难之中的热血青年发起组建的,因此,自诞生之日,就一直依靠、领导青年,并关心青年的成长,发挥好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青年看作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从来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并且强调“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为更好地把握新时代青年的思想动态和走向,我们特组织这组专题,探讨当代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运用价值观来指导其工作和行动。

青年爱国主义思想与志愿服务研究^{*}

邹宇春 李建栋

摘要: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相关数据,对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状况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提炼出一个爱国主义思想因子作为爱国主义思想的测量指标。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水平较高;年龄越小的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率越高;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参与率仍有提升空间;爱国主义思想与户口、婚姻、年龄、民族等指标不相关,但受志愿服务参与、教育程度、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对社会保障评估等因素影响;与其他青年群体不同,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和爱国主义思想不存在统计相关性。建议把志愿服务作为提高青年爱国主义思想水平的一个抓手,但相关措施需要考虑青年群体内部代际等差异;提升爱国主义思想还要着眼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并在校园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关键词:青年 爱国主义思想 因子分析 志愿服务

一、问题的提出

爱国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义属于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当代爱国主义与近代爱国主义、古代爱国主义等传统爱国主义存在差异(李乐刚,2000;李春玲、刘森林,2018)。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在不同的研究时点,尤其是在发生明显社会结构变化或重大国家政策调整时期,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会发生变化,及时构建、测量研究时点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指标并适时评估爱国主义思想状况,成为青年爱国主义思想状况研究的重要内容(陈怀林,2006;吴鲁平、刘涵慧,2014)。

哪些因素导致青年爱国主义思想出现变化?这是研究青年爱国主义思想状况的另一重要内

*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项目主持人为李培林、陈光金。此外,本研究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建设”(16ZDA079)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重点学科发展社会学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综合指标集成实验室”等项目支持。感谢以上资助,文责自负。

容。从生命周期和认知理论来看,青年时期不仅是个体生命周期中身体变化最活跃的阶段,也是主观态度和认知极易受外在客观因素影响阶段。分析并掌握青年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深入了解青年爱国思想的形成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预判其发展趋势。当前研究从人口学、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多种可能性因素。随着青年志愿服务在社会服务与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重要性逐渐加大,志愿服务成为近年颇受关注的影响因素。部分学者致力探讨青年志愿服务与青年爱国主义及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并认为志愿服务有助于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加强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张伟娟 2014;莫春梅 2019)。不过,囿于有关青年志愿服务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不足,这些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归纳推理法,来自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无法从统计上有效验证我国青年整体的志愿服务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研究领域有必要及时构建当下青年爱国主义思想的测量指标并评测其现状,进一步探究青年的志愿服务现状及其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为我国青年的中长期发展提供规划参考和评估。为此,本研究采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的相关数据,测量和评估我国青年当前的爱国主义思想状况和志愿服务参与情况,并就后者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行讨论。

二、研究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 爱国主义思想及其测量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之一。“爱国”二字较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如《战国策·西周策》的“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的“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等,均表明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历史久远(转引自王亚均 2012)。不过,晚清之前的爱国主义都属于古代爱国主义,以尊崇血缘和地缘为主,表现为以忠君和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爱国精神。近代爱国主义发轫于晚清到“五四运动”期间,具有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挽救民族于生死存亡的思想内涵,其最鲜明的表现是运用理性的世界观向西方学习并通过革命的手段以振兴中华。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经历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呈现感性和理性并存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爱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又发生了变化,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其核心内涵,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爱国主义包括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行为两部分,它历史悠久但内涵和表现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提高、丰富,总与一定时代最进步、最优秀的思想理论相一致,并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吴金钟, 1992)。

由于爱国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具有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特点(荣开明 2020),国内外学者对爱国主义的概念内涵、表现形式存在不同的理解(Poole 2007: 129-145;吴鲁平、刘涵慧 2014)。适时研究分析不同时期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现状,对指导青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变动性,对爱国主义思想的测量成为当代爱国主义研究的难点。尽管学界对新时代爱国主义内涵的理论阐释成果已较为丰富,但对其实施量化测量的研究成果却略显不足(徐雷 2018)。许多学者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深入讨论了爱国主义的内涵与维度。尤其在2019年《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发布后,许多学者从如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视角出发,将爱国主义分解为“知、情、意、行”四个维度(徐国亮、邓海龙 2020;兰涵旗、余斌 2020)。其中,“知”是对国家、历史、政治制度的认知,“情”是对国家、民族、同胞、文化等的情感,“意”为意志品格,“行”为行为。肖群忠、李莹莹(2019)进一步拓展为五个维度,“知、情、意、信、行”,其中的“信”是对祖国的坚定信念,相信国家会更加繁荣昌盛,相信国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田玉敏(2020)提出在“信”这一维度,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才更符合习近平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这些维度涵盖了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行为两部分,而爱国主义思想又具有两大特征维度:理性维度和感性维度。相对定性研究成果来说,学者们围绕对国家的认知、情感、认同、行为等内容,在测量爱国主义思想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子指标。例如,陈怀林(2006)从对国家的认知、对国家的情感和爱国行为意愿三个层面

来测量爱国主义倾向;吴鲁平、刘涵慧(2014)将8个测量中学生爱国主义的指标归为一般自豪感(情感)、国家优越感、国家责任感(理性行为)三个维度;许龄木(2018)针对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提出爱国主义的三个维度为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国家集体自尊;徐雷(2018)针对大学生编制了更为全面的量表,提出大学生爱国情感心理结构主要由国家归属、国家自豪、国家尊严、国家责任4个典型的测评指标组成,并编制了由22个项目构成的大学生爱国情感量表。

综合来看,虽然测量爱国主义思想的指标较为繁多且各有特点,但均围绕爱国主义思想的理性维度和感性维度进行测量。不过,这些测量研究存在三点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指标的构建上,研究者建构的测量指标几乎最终都无法聚合,在分析比较时仍表现为多个维度,无法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指标的研究。二是这些研究较少将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直接纳入指标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有效测量我国当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征。三是在测量对象上,多是以大学生或某几个地区(或学校)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难以反映新时代我国青年整体的爱国主义状况。因此,本研究尝试在这些方面有所补充和发展。

(二) 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因素: 志愿服务

为更好地了解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变化,学者特别关注哪些因素影响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哪些因素会导致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年群体内部出现差异?已有研究提出了视角各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特征;宣传、舆论、信息等媒体因素;国家及政府的表现;由父母、教师、同学等构成的社会化环境;具有不同教育方式的学校教育,等等(Penner & Finkelstein, 1998; Fényes & Pusztai, 2012; 陈怀林, 2006; 李艳、曾露, 2014; 佟德志等, 2019)。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年群体内部出现差异或发生变化的缘由,但大都以外在结构或外在环境性因素为主,较少涉及青年群体的能动性因素。爱国主义思想具有理性认知的维度,而认知理论认为个体与外在环境的交互作用、实现平衡是影响认识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Bandura, 1969: 213-262)。也就是说,青年群体参与外在社会的行动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爱国主义的认知形成。为此,部分研究者开始把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纳入爱国主义研究的视域。此外,行为理论、自我效能感、社会服务等理论都为志愿服务成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支持。

现代意义的志愿服务发源于工业革命后的欧美等国家(陆士桢、张网成, 2014: 1-8)。由于人类社会存在劳动分工和地位分化,每个家庭都会面临各种生存风险而无法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能自给自足,因此每个社会都必须在其规范和制度层面做好社会团结和自力更生的对立与统一,强调社会成员要有自我担当意识的同时还要培养其奉献精神 and 互助习惯(陆士桢、张网成, 2014: 1-8)。20世纪70年代前后,志愿服务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的稳定、团结和发展起到了突出作用,志愿服务提供的劳动价值推动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志愿服务精神增进了社会的凝聚和信任。可以说,志愿服务在健全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方面有重要作用(魏娜、刘子洋, 2017)。20世纪80年代,志愿服务传入我国。作为一种自愿、无偿、主动利他的服务行为,志愿服务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兼相爱、扶贫济困、尊老爱幼、学雷锋做好事等理念极为契合,很快在我国传播并发展起来(江汛清, 2008)。

已有研究发现,青年人比中年人、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志愿者(邹宇春等, 2020: 224-241)。《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提出要重点推进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鼓励大中专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制定了“到2025年实现实名注册的青年志愿者总数突破1亿人”^①的目标。志愿服务被认为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手段和载体,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育需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学雷锋志

^① 新华社 2017,《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4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4/14/c_1120806695_2.htm)。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3日。

愿服务、精神文明创建之中。^① 志愿服务成为青年服务社会、国家的重要渠道。

由上可见,作为青年群体参与社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方式,志愿服务在青年群体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吴鲁平(2007)在研究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时提出可将其分为三类:传统性动机(以“责任感”为轴心)、现代性动机(以“发展”为轴心)和后现代性动机(以“快乐”为轴心)。其中,志愿服务的“责任感”动机可以促进爱国主义,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对在校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发现,志愿服务活动本身的价值追求(“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和实践形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志愿服务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提供了实践平台,可以通过志愿服务促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化,把爱国理念转化为爱国行动(张伟娟 2014;张叶云 2015;莫春梅 2019)。

这些研究从理论上为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促进作用做了很好的论述,但遗憾的是,研究对象大部分是以大学生为主,并没有覆盖整个青年群体,而在校大学生与其他青年群体在社会经历、理性认知、压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涉及的志愿服务类型也不全面,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志愿服务。此外,研究方法也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研究结果缺少全国数据予以佐证。

(三)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针对上文提及的有关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行为以及两者关系的研究不足,本研究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拟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当前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状况如何?二是当前我国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情况如何?三是我国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是否能够提升其爱国主义思想水平?

在回答以上三个问题时,本研究认为有一个研究视角需要纳入分析框架。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城乡居民的代际差异已极为明显,且代际的年龄差距在缩小。对青年群体来说,已有研究发现“80后”“90后”“00后”在许多领域都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比如,秦广强(2014)发现,20多岁的年轻人由于思想不够成熟、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经济压力较大等原因,具有更低的社会公平感,但这一现象在30多岁时会趋于缓和;李春玲(2015)的研究也发现,相比其他世代群体,“80后”和“90后”具有更明显的后物质主义倾向,而且这一倾向在“90后”中尤为明显。王沛沛(2016)的研究发现,“90后”的社会公平感显著高于“80后”。此类青年群体内部代际差异的研究,为更深入、有针对性地了解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鉴于此,本研究拟围绕以上三个研究问题,尝试构建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思想的测量指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 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年群体内部存在代际差异;

研究假设 2: 志愿服务行为在青年群体内部存在代际差异;

研究假设 3a: 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对其爱国主义思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研究假设 3b: 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促进作用在青年群体内部存在代际差异。

三、数据来源、概念界定与变量测量

(一) 数据来源

从已有量化研究文献来看,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的测量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测量法。与基于观察法、个案访谈法等形成结论的定性研究相比,采用问卷调查的难点有二:一是需要研究者较好地把握研究时点的概念内涵并将其操作化为问卷的测量指标;二是在正式实施调查之前要做好测量指标的认知测试和试调查。两者缺一都会降低测量质量,导致结果“失真”或“失准”而无法准确

^① 新华社 2019,《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11月12日(http://www.gov.cn/jzhengce/2019-11/12/content_5451352.htm),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2日。

评估。不过,随着国内问卷调查方法的专业水平逐渐提高,这两方面的难度也在逐渐降低。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9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2019年的调查是这一调查的第七期,涉及全国的149个县(区),596个居(村)民委员会,最终有效样本数为10283。

本研究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将15—34岁人口界定为青年群体。由于CSS的受访者必须为18—69岁成年人,因此本研究最终抽取出生年份在1985—2001年之间的受访者,样本量为2420份。2019年的CSS数据是目前国内学术机构发布的最新的全国抽样入户调查数据,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测量指标,既包含了志愿服务模块又包含了爱国主义模块的调查数据。

(二) 核心概念界定与变量测量

1. 爱国主义思想: 概念与测量

尽管国内学者对爱国主义的内涵存在理解上的差异,但都倾向赞成,爱国主义实质上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忠诚和热爱,是一种最深厚的情感依附,并且还包括对自己祖国的理性认知和行为自觉(吴金钟,1992;吴鲁平、刘涵慧,2012),包括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行为。爱国主义思想包括对祖国的理性认知和感性态度两个维度。

2019年的调查在设计爱国主义测量指标时,采用了文献资料分析法、德尔菲法,并对指标操作化后的问卷问题进行了认知测试和试调查,确保测量指标能准确、稳定地测量爱国主义思想。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以及入户访问调查的实际特点,在指标设计时采用“宜精简不宜繁多”“宜询问不宜解释”的原则。鉴于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的本质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统一性(习近平,2019),为了更好地测量其时代内涵,CSS最终选用了4个子测量指标,包括“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得到金钱和幸福”“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混乱”;相应的选项是对这些表述的同意程度,包括“1很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较同意”“4很同意”“不好说”。^①这四个指标分别测量了感性爱国主义维度和理性爱国主义维度。其中,测量理性维度的两个指标分别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得到金钱和幸福”“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混乱”,前者测量的是对国家制度的认知,后者测量对党的认知;感性维度包括“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两个指标,前者测量国家自豪感,后者测量国家认同度。基于这四个指标,本研究在下文将运用因子分析,生成新的爱国主义思想因子。

2. 志愿服务: 概念与测量

与爱国主义思想相比,志愿服务的概念内涵已相对清晰。我国于2017年颁布的《志愿服务条例》指出,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总的来说,它是自愿、无偿、公益地为家庭成员之外的人或事物提供的服务。这种服务具有劳动属性,不是捐钱、捐物、献血等捐赠行为,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对志愿者本人和志愿服务受助者都有很大的助益(邹宇春等,2020: 224-241)。

2017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志愿服务测量指标体系,2019年的调查沿用此套指标测量受访者的志愿服务情况。具体来说,志愿服务的测量指标为“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共包含对13类志愿服务的测量:儿童关爱、青少年辅导、老年关怀、妇女维权/保护、扶助残障、支教助教、扶贫济困、医疗护理、法律援助、环境保护、抢险救灾、国际援助、其他(拥军优属、教育助学、心理咨询、大型社会活动等)。如果参加过上述志愿活动,“志愿服务”变量就为1,如果没有则“志愿服务”变量就为0。在模型中,“志愿服务参与”是解释变量。

^① 原问卷调查采用的是逆序问题。本研究为方便阅读调整为正序。数值大表示爱国主义强烈。选择“不好说”视为该问题的回答缺失。

3. 调节变量

为更好地进行青年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分析,本研究设置了代际调节变量以验证不同的青年代际组是否会在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以及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等三方面存在差异。传统的青年代际划分方法是将青年的内部代际分成“80后”“90后”“00后”,但由于2019年的CSS数据的青年样本中“00后”样本较少,加之当前代际的年龄差距在缩小,五年为一代的代际划分标准在当前世代研究中较为常见。因此,本研究根据出生年,近似地把青年样本按照五年为一代分为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1990—1995年出生年龄组、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三组,生成新的代际变量。这样分组既解决了“00后”样本过少的缺憾,也能更细致地验证青年内部的代际差异情况。

4. 其他变量

在进行假设验证时,本研究基于以往爱国主义影响因素相关研究选取主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民族、户口、教育、党员、收入、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和对社会保障评估。这些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控制变量基本情况表

变量名	变量及测量指标说明			百分比/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性=1,女性=0			男性比例41.24%	
婚姻	有配偶=1,其余婚姻状态=0			有配偶比例51.61%	
民族	汉族=1,非汉族=0			汉族比例90.87%	
户口	农业户口=1,其余户口=0			农业户口比例68.26%	
党员	党员=1,非党员=0			党员比例7.40%	
出生年(样本占比)	1985: 5.29%	1990: 6.78%	1996: 5.08%		
	1986: 7.11%	1991: 5.62%	1997: 5.12%		
	1987: 8.14%	1992: 4.59%	1998: 5.74%		
	1988: 5.58%	1993: 5.45%	1999: 6.07%		
	1989: 7.40%	1994: 5.25%	2000: 7.56%		
		1995: 4.92%	2001: 4.30%		
教育	从低(未上学=1)到高(研究生及以上=9)			5.425	2.214
家庭状况	1=低收入,5=高收入(调查员评估)			2.958	0.843
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	取值1-4,数值大表示认可			2.902	0.715
对社会保障评估	取值1-10,1不好,10最好			6.702	2.022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样本量:2420个。

四、爱国主义思想与志愿服务参与的现状

(一) 爱国主义思想:四个测量指标

爱国主义思想测量指标结果(见表2)显示,合并“很同意”“比较同意”后持肯定回答者超过90%的指标是“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最高,达到97.14%;“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居第二,达到92.81%;“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混乱”为91.35%,居第三。对“每个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得到金钱和幸福”的回答稍低,但仍有超过82.22%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其中三个指标为“很同意”的占比超过半数。可见,青年群体在四个维度上的爱国水平均具有较高的绝对值。需要提及的是,青年群体对“每个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得到金钱和幸福”(对

制度的认知)持负面态度的占比最高,达到 17.78%,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青年群体对当前制度的公平、公正性的认知评估有待提高。

表 2 青年爱国主义思想测量指标情况表

	很不同意	不太同意	比较同意	很同意	同意*	样本量
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自豪)	1.08%	6.11%	38.61%	54.20%	92.81%	2406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认同)	0.58%	2.28%	25.45%	71.69%	97.14%	2409
每个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得到金钱和幸福(制度)	2.53%	15.25%	38.14%	44.08%	82.22%	2407
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混乱(共产党)	0.96%	7.69%	35.46%	55.89%	91.35%	2394

注“同意”合并了“比较同意”和“很同意”。

由于年龄处于 15—34 岁的青年群体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内部差异,本研究接着对青年群体进行内部的代际比较,以分析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否存在内部的代际差异。统计结果表明(见表 3),国家认同指标不存在代际差异。关于国家自豪感指标,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比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有更高的正面回答。关于制度认知指标,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相比其他两个群体给出了更低的答案。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在对党的认知指标上给出了特别高的回答。可见,除了国家认同,爱国主义思想的其他三个指标都在青年群体内部存在代际差异。

表 3 爱国主义思想测量指标的代际差异

	出生年分组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与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的差异	t - value
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自豪)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	3.432	0.703	806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	3.444	0.653	782	0.012	0.35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	3.501	0.620	818	0.070	2.11**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认同)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	3.686	0.522	807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	3.680	0.583	785	-0.006	0.22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	3.681	0.576	817	-0.006	0.23
每个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得到金钱和幸福(制度)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	3.291	0.798	801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	3.220	0.823	788	-0.071	1.75*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	3.203	0.775	818	-0.088	2.25**
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混乱(共产党)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	3.519	0.650	800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	3.429	0.716	781	-0.090	2.61***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	3.440	0.666	813	-0.078	2.39**

注:均值是将此四个指标当作定距变量处理;*** $p < 0.01$, ** $p < 0.05$, * $p < 0.1$ 。下同。

(二) 爱国主义思想的因子分析

上文对四个指标的现状进行了较为清楚的分析评估,但是每一个指标本身并不能代表“爱国主

义思想”只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表现/测量。因此,在讨论爱国主义思想时,需要对4个指标都加以分析,并且无法确定4个指标之间的权重,这给分析“爱国主义思想”带来复杂性。如果能够对这些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并找到代表爱国主义思想的单一因子,将提升爱国主义思想研究结果的易阐述性、易比较性,也有助于爱国主义思想的指数分析的开展。

鉴于因子分析方法可将多个实测变量转变为少数几个或一个综合指标(或称潜变量),通过降维把相关性高的变量聚在一起,减少需要分析的变量数,进而减少问题分析的复杂性,本研究采用此方法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四个指标进行降维。通过选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成功提取出“爱国主义思想”因子,模型见图1。其中,爱国主义思想是潜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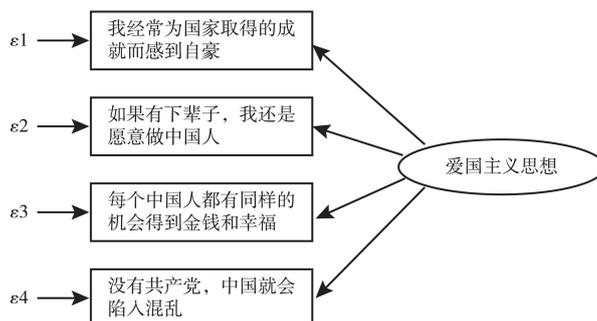


图1 爱国主义思想的因子模型

因子分析的统计结果如表4,此分析通过了KMO和Bartlett检验。其中,KMO为0.698,大于0.6,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要求,意味着数据可用于因子分析研究,也通过了Bartlett球形度检验($p < 0.0001$),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4 爱国主义思想的因子分析结果

	指标 Q1	指标 Q2	指标 Q3	指标 Q4
均值	3.463	3.687	3.243	3.461
标准差	0.658	0.540	0.795	0.679
样本数	2367	2367	2367	2367
相关系数 Q1	1.000			
相关系数 Q2	0.391	1.000		
相关系数 Q3	0.198	0.335	1.000	
相关系数 Q4	0.287	0.370	0.250	1.000
共同因子方差	0.457	0.615	0.378	0.475
特征根值	1.925	0.807	0.705	0.562
因子模型	0.676	0.784	0.615	0.689
因子得分(载荷)	0.351	0.407	0.319	0.358

表4中的因子得分(载荷)表示因子分析生成的因子如何取决于最初的测量指标,显示的是标准化之后的系数。以第1个回答变量的得分为0.351为例,其意义表明该变量的1个标准差的变化会带来爱国主义因子0.351的变化。因此,爱国主义思想因子可写成:

$$\text{标准化的爱国主义思想因子} = 0.351 \times Q_1 + 0.407 \times Q_2 + 0.319 \times Q_3 + 0.358 \times Q_4$$

可见,通过因子分析方法,CSS2019中的四个测量爱国主义思想的子指标恰好可以生成一个因

子,此因子即为爱国主义思想因子。4个测量指标降维至1个爱国主义思想因子,更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代际分析。否则,不同代际对4个指标的回答高低不一,无法准确提炼出爱国主义思想的代际差异。统计显示(见表5),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的爱国因子均值为0.0437,1990—1995年出生年龄组的爱国因子均值为-0.0336,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的爱国因子均值为-0.0105。也就是说,1990—1995年出生年龄组的爱国因子最低,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的爱国因子最高。不过,上述均值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研究假设1未通过检验。

表5 爱国思想因子的代际差异

代际/出生年分组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与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的差异	t-value
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	0.0437	0.9920	788		
1990—1995年出生年龄组	-0.0336	1.0552	771	-0.0774	1.49
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	-0.0105	0.9522	808	-0.0542	1.11

(三)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参与的调查数据显示(见表6),约37.40%的青年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参加过至少一种类型的志愿活动。青年人参与比例较高的志愿服务类型是:环境保护、老年关怀、儿童关爱三类,均有超过10%的参加比例。

表6 志愿服务参与情况表

儿童关爱	青少年辅导	老年关怀	妇女维权/保护	扶助残障	支教助教	扶贫济困
11.78%	7.69%	12.56%	1.28%	5.50%	3.60%	7.36%
医疗护理	法律援助	环境保护	抢险救灾	国际援助	其他	合计
4.05%	1.24%	17.11%	3.02%	0.08%	1.78%	37.40%

分析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种类的数据发现,16.61%的青年受访者只选择了一项志愿活动,有20.78%的受访者参加过两类或更多类志愿活动。需要强调的是,约62.60%的青年受访者在过去一年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志愿活动(见表7)。这意味着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率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表7 参加志愿服务的种类情况

参与种类数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及以上
频数	1515	402	247	146	59	51
百分比(%)	62.60	16.61	10.21	6.03	2.44	2.1

本研究接着分析了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情况是否存在代际差异。统计结果表明(见表8),随着代际后移,志愿服务活动参加比例越高。这尤其表现在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其均值0.486远高于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和1990—1995年出生年龄组。这意味着,我国青年中的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有更多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他们拥有更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也具有更为明显的志愿服务精神。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存在内部的代际差异,研究假设2通过检验。

表 8 志愿服务参与的代际差异

代际/出生年分组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与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的差异	t - value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	0.298	0.457	811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	0.335	0.472	789	0.036	1.56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	0.486	0.500	820	0.188	7.92***

本研究把爱国主义思想因子与志愿服务的代际变化以直观方式呈现(见图 2)。爱国主义思想因子的代际变化不明显,假设 1 未通过检验;而志愿服务变量的代际变化明显,假设 2 通过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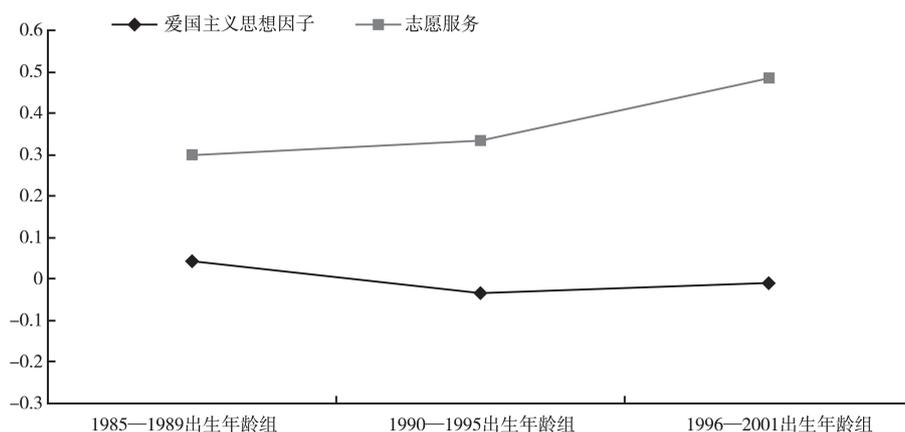


图 2 爱国主义思想因子与志愿服务的代际差异

五、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一) 志愿服务与爱国主义思想的相关分析

已有研究认为,志愿服务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载体和平台,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有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首先把爱国主义思想因子与志愿服务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由表 9 可见,爱国主义思想因子与志愿服务有着显著的正相关。不过,相关系数不大,仅为 0.073。之后进一步的代际分析发现,对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来说,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但对其他两个青年群体来说,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都高于青年的全样本。

表 9 爱国主义思想因子与志愿服务的相关

	相关性系数	显著性(P 值)	样本数
青年样本	0.073	0.0004***	2367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	0.091	0.0106**	788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	0.118	0.0010***	771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	0.021	0.544	808

(二) 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接着用回归分析检验假设 3a。方程如下^①:

$$\text{爱国因子} = \beta \times \text{志愿服务} + \sum \gamma \times \text{控制变量} + \varepsilon$$

回归方程建立的基础是志愿服务变量与爱国主义思想变量测量内容的时间次序。CSS2019 是横截面数据,但测量的志愿服务是关于过去一年中是否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表现,而爱国主义思想是调查期间最后时间点的回答。逻辑上来说,过去一年的行为会影响最后时间点的状态。本研究首先建立基准模型,把所有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教育、党员身份、户口、民族、婚姻、经济状况、政府绩效评估、社会保障评估)对爱国主义思想因子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教育、政府绩效评估、社会保障评估显著外,其他控制变量均不显著。^②为了模型的简约性和解释力,本研究接下来只把这些有显著作用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把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因子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0),志愿服务变量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意味着我国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对其爱国主义思想起到促进作用,支持了假设 3a。在控制变量中,青年的教育程度显著为负,对政府绩效的评估、对社会保障的评估均显著为正。并且,从标准化后的系数大小可见,对社会保障的评估对爱国主义因子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对政府绩效的评估,志愿服务的影响力排在第三位,教育排在第四位。

表 10 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因子的回归模型

	基准模型	模型 1: 青年群体	模型 1 的标准化系数
控制变量			
教育程度	-0.0238 **	-0.0319 ***	-0.0706
	0.0110	0.0111	
政府绩效评估	0.2160 ***	0.2150 ***	0.1469
	0.0313	0.0312	
社会保障评估	0.0864 ***	0.0841 ***	0.1696
	0.0107	0.0107	
其他控制变量	系数不显著 结果未予呈现		
自变量			
志愿服务		0.1767 ***	0.0858
		0.0439	
截距项	-1.6584	0.2856	
	11.223	11.197	
R ²	7.16%	7.82%	
样本数	2286	2286	

最后,本研究对假设 3b 进行检验。本研究把新生成的代际分组变量与志愿服务变量做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检查该交互项的显著性。模型如下^③:

① “ β ”为志愿服务变量的回归系数 “ γ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 ε ”为误差项。

② 为节省文章篇幅,统计结果表格未予呈现。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③ “ β ”为志愿服务变量的回归系数 “ γ ”为调节变量的回归系数 “ δ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 ε ”为误差项。

$$\text{爱国因子} = \beta \times \text{志愿服务} + \gamma \times (\text{志愿服务} \times \text{代际组}) + \Sigma\delta(\text{控制组}) + \varepsilon$$

本研究分别以不同的代际组为参照组(参见表 11)。首先,以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为参照组(模型 2-1)。结果显示,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与志愿服务的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负,但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的交互项不显著。这说明,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和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之间没有统计显著差别,但此影响在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中显著高于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其次,以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为参照组(模型 2-2)。结果显示,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与志愿服务的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负,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的交互项不显著。再次说明,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和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之间没有统计显著差别,但此影响在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中高于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总的来说,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和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之间不存在差异,但均与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上文的相关分析结果契合。模型假设 3b 得到了验证。

表 11 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因子的回归模型:代际差异分析

	模型 2-1: 以 1985—1989 年 出生年龄组为基准	模型 2-2: 以 1990—1995 年 出生年龄组为基准
教育程度	-0.0376***	-0.0376***
	0.0095	0.0095
政府绩效评估	0.2140***	0.2140***
	0.0310	0.0310
社会保障评估	0.0819***	0.0819***
	0.0106	0.0106
志愿服务	0.2361***	0.2047***
	0.0682	0.0664
1996—2001 年出生年龄组 × 志 愿服务	-0.1678**	-0.1363*
	0.0806	0.0780
1990—1995 年出生年龄组 × 志 愿服务	-0.0314	
	0.0873	
1985—1989 年出生年龄组 × 志 愿服务		0.0314
		0.0873
截距项	-1.0254***	-1.0254***
	0.1067	0.1067
R ²	7.49%	7.49%
样本数	2307	2307

六、结论与讨论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习近平,2019)。本研究首先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进行了详细梳理,提出爱国主义思想主要包括理性与感性两个维度,并通过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设计的 4 个指标评测了当前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

现状。研究发现:

第一,我国青年群体在国家认同感、国家自豪感、对党的认知、对制度的认知四个指标上持肯定态度的比例超过八成,整体的爱国主义思想水平较高。同时,对这四个指标进行代际分析发现,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在对制度的认知、对党的认知两个指标上得分最高,说明这一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信任和支持,偏重理智爱国;相比之下,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在国家自豪感上得分最高,但对制度的认知最低,偏重情感爱国;1990—1995年出生年龄组基本介于两者之间。

第二,为了更简单、有效地研究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本研究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四个测量指标进行降维处理,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爱国主义思想”因子。这些测量指标通过因子分析能得到一个因子,可供学者在测量评估爱国主义思想时借鉴参考。本研究随后对此因子进行青年内部的代际比较,结果发现,三个青年代际组之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别。这说明,尽管青年群体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单个指标上存在代际差异,但青年群体内部代际之间具有较为稳定、一致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三,青年群体中参加过志愿服务的比例不足四成,青年志愿服务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发现,青年志愿服务参加比例随代际后移而增加,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青年显著地比其他代际的青年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这可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和1990—1995年出生年龄组青年处于应对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的状态,缺少充足的时间参与志愿服务,而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青年相对来说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主观上,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青年相对具有更高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他们对实现社会价值、自我价值等方面有更多的精神追求。当然,这两方面的原因解释有待进一步研究予以验证。

第四,志愿服务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回归分析发现,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能促进他们爱国主义思想水平的提升。并且,这种影响关系对不同的青年代际群体来说存在差异,即这种积极的影响受到青年代际的调节,表现为:在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与1990—1995年出生年龄组之间不存在差异,但这两组都分别与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存在差异;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对青年爱国主义思想的作用,在1985—1989年出生年龄组、1990—1995年出生年龄组均明显强于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认为有几点值得探讨。

第一,尽管本研究发现全国青年群体的四个爱国主义思想指标的水平都较高,但基于CSS2019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它们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结果显示,全国城乡居民在国家自豪感、国家认同感、对党的认知、对制度的认知四个维度持肯定态度的占比分别是93.62%、97.65%、85.40%、93.54%,青年群体分别低了0.82%、0.52%、3.19%、2.19%。相比之下,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仍有可提升的空间,尤其在对制度的认同方面。至于如何提升,本研究发现,已有研究中提及的部分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因素并没有显著影响。排除调查方法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或许是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较为稳定,不易受到其他因素干扰。不过,除了本研究关注的志愿服务参与,教育、对政府绩效评估、对社会保障评估等变量也会对爱国主义思想发生显著的影响。从影响大小来看,四个因素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对政府绩效评估、对社会保障评估、志愿服务、教育,前两者是宏观因素,后两者是个体因素。这意味着,当前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水平更多地会受到宏观外在环境的影响,加强政府建设、努力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为重要。同时,加强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也是从个体层面提升青年群体爱国主义思想水平的重要抓手。

第二,与其他几个影响因素不同,教育程度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产生的是负面影响。本研究认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教育程度提高改变了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可掌握的相关资源。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广的生活半径,接触另类信息的机会更多(陈怀林,2006),生活方式、工作理念、价值观等受到各种文化冲击的概率更高、强度更大;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晕轮效应、对各类信息评估能力不足等原因,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爱国主义思想。吴鲁平和刘涵慧(2014)、

李春玲和刘森林(2018)等的相关研究均得出类似讨论。二是当前校园中还存在着一定量的与爱国主义思想相悖的思想观点。比如,宣扬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把政府视为影响赚钱的障碍,呼吁资本无国界;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也在不断地解构和重构中国革命史,甚至有观点认为爱国主义已经过时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受众在面对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信息、观点或理念时,应具备批评性评估能力(陈怀林,2006)。鉴于此,有必要加强青年群体对各类信息、资源、观点的批评性评估能力建设。此外,基于青年群体对制度认知排位最末以及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青年的制度认知得分较低的情况,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加强对高学历青年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加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客观阐释和正确引导。

第三,分析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志愿服务现状时,本研究引入了代际视角,以五年为一代在青年群体内部划分代际组。这种代际划分方式是在以十年为一代的传统代际划分方法上的拓展,而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也证明,青年群体内部的代际分化已较为明显,尤其是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与其他组有许多不同,说明这种划分有助于更准确地研究青年群体。需要提及的是,尽管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具有更高的志愿服务参与率,但他们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对其爱国主义思想却没有显著影响,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可以明确的是,通过推动志愿服务参与以提升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做法要考虑不同代际青年的特点才能更有成效。

本研究存在有待改进之处。首先,本研究分析了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对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机制研究,但实际上其内在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比如,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如何对其爱国主义思想发生影响。其次,本研究引入了代际视角,但在代际差异分析时并未区分年龄、时期、同期群效应。这有待以后把历年的CSS数据合并后采用年龄—时期—同期群(APC)分析来补充和完善本研究的结果。最后,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舆情调查发现,我国过半青年的“西方观”发生了变化^①,青年群体表现出更强的制度自信,因此本研究基于CSS2019得到的相关观点有待最新数据加以验证或更新。

随着社会变迁呈现全球化、信息化、平面化、草根化等特征,青年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影响日渐显著,他们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主力军,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因此,对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紧紧抓住。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民族没有魂。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曲折历程,采取符合青年各个代际特征的方式,加强青年对党史、建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四史的学习,是提升当前青年人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路径。引导广大青年在学习和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学习和理解中达成共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陈怀林,2006,《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实证分析接触“另类信息”对中国大陆受众爱国主义倾向的影响》,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II)》(未刊稿)。
- 江汛清,2008,《国际志愿服务及其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启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
- 兰涵旗、余斌,2020,《从“知情意行”维度加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第20期。
- 李春玲,2015,《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河北学刊》第3期。
- 李春玲、刘森林,2018,《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乐刚,2000,《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爱国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 李艳、曾露,2014,《基于网络的大学生理性爱国探析——以钓鱼岛争端为例》,《经济研究导刊》第30期。

^① 白云怡、曹思琦、陈青青,2021,《过半中国青年“西方观”因疫情改变》,《环球时报》4月2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514670230479995&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23日。

- 莫春梅, 2019,《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以志愿服务精神为抓手》,《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第3期。
- 秦广强, 2014,《当代青年的社会不平等认知与社会冲突意识——基于历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 荣开明, 2020,《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和实践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重要论述》,《学习论坛》第11期。
- 田玉敏, 2020,《习近平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五重维度》,《天津农学院学报》第1期。
- 佟德志、王旭、朱炳坤, 2019,《大学生理性爱国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大学生4054份社会调查问卷的分析》,《思想教育研究》第6期。
- 王沛沛, 2016,《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青年研究》第5期。
- 王亚均, 2012,《爱国主义的传统文化渊源》,《学理论》第35期。
- 魏娜、刘子洋, 2017,《论志愿服务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6期。
- 吴金钟, 1992,《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
- 吴鲁平, 2007,《志愿者的参与动机: 类型、结构——对24名青年志愿者的访谈分析》,《青年研究》第5期。
- 吴鲁平、刘涵慧, 2012,《中国青少年国家态度与全球态度的关系研究》,《青年研究》第5期。
- , 2014,《青少年爱国主义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北京与郑州两地大中学生的证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1期。
- 习近平, 2019,《接续奋斗征程再谱青春之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5月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2334210190616767&wfr=spider&for=pc>), 最后访问日期: 2021年4月8日。
- 肖群忠、李莹莹, 2019,《“爱国主义”意蕴论析》,《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徐国亮、邓海龙, 2020,《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四重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第1期。
- 徐雷, 2018,《大学生爱国情感的测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许龄木, 2018,《中国消费者的国货意识及其对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湖北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伟娟, 2014,《刍论完善志愿服务活动与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导刊》第8期。
- 张叶云, 2015,《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研究——基于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视角》,《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
- 陆士桢、张网成, 2014,《前言: 关于志愿服务》,陆士桢主编《中国志愿服务大辞典》,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邹宇春、张丹、张彬、王翰飞、崔晨洁, 2020,《2019年中国活跃志愿者现状调查报告》,李培林、陈光金、王春光主编《202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Bandura, A. 1969, “Social - Learning Theory of Identificatory Processes.” In D. A. Goslin (ed.) ,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 Fényes, H. & G. Pusztai 2012, “Volunteering among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 Focusing on the Micro - Level Factors.”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 Policy* 3(1) .
- Penner, L. A. & M. A. Finkelstein 1998, “Dispositional and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Volunteer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2) .
- Poole ,R. 2007,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In I. Primoratz & A. Pavkovic (eds.) , *Patriotism: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邹宇春)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李建栋)
责任编辑: 林 红

Special Subject on the Study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Youth's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Research on the Youth's Patriotic Ideology and Voluntary Service

..... *Zou Yuchun & Li Jiandong*(1)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Chinese Social Survey” in 2019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Chinese youth's patriotic ideology , the status of voluntary servi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 hence extract the factor of patriotic ideology as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 of patriotic ideolog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youth group's patriotic ideology is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the younger the youth ,the higher the rate of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 regarding the patriotic ideology and the rate of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 ,there still exists improvement space; the patriotic ideology is not related with the factor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marriage , age , ethnicity , etc. , but is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of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 , educational level ,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owards local government ,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 etc. ; different from other youth groups ,regarding the youth group born between 1996 and 2001 , there doesn't exist the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 and patriotic ideology. Hence , we suggest that the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 could be a starting point to enhance the youth's patriotic ideology , but the related measures should consid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within the youth group. In addition , regarding the improvement of patriotic ideology , we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 and strengthen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schools.

Keywords: Youth Patriotic Ideology Factor Analysis Voluntary Service

The Changes and Differences Regarding the Youth's Identification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 *Li Wei*(16)

Abstract: Drawing upon the data from “Chinese Social Survey” in 2013 and 2019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contemporary youth group's Identification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 its variation tendency and intra - group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youth generation has highe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 “civility” , “freedom” , “equality” , “rule of law” and “integrity” , etc. However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values of “patriotism” and “harmony” is relatively lower than other older generations. From 2013 to 2019 ,the youth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values of “patriotism” and “rule of law” improved greatly;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values of “dedication” and “friendship” increased somewhat. Regarding the value identification , there exists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youth group. For the youth who have middle and high educational background , pursue middle - collar occupation and have high income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identify with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 “freedom” , “rule of law” and “integrity” , etc. While for the youth who have low educational background , pursue agricultural labor and have low income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identify with values of “civility” , “harmony” , “equality” and “justice” , etc. With the generation succession , the current youth generation would gradually go to the center of social stage. To a large extent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would represent the status of social consensu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towards the youth group.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task to cultivat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You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Value Identification Social Survey